

美国“高考状元”的经验与感悟

□陈心景

美国自1964年开始设立并由总统颁发的高中毕业生国家最高荣誉大奖之一的“总统奖”已有五十多年,每年都有大约140名高中毕业生获得该奖项。该奖项获得者,每州男女学生各1名,另有15名的不定名额和20名艺术特长生。除了艺术特长生,每个州的获奖者都是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在全州前30名内,并参照学生特征、领导才能和社区服务活动、个人陈述以及小论文的分析等诸项条件,评选出最终获奖学生。我们将上述获奖者称为美国的“高考状元”。

反观我国的高考状元,研究者发现他们极少有人在政界、商界或者学界成为杰出人物,这是因为我国的高考状元基本上是以考分来评定的。那么,美国采用了多项指标评选出的“状元”,在多年以后的成就又如何呢?美国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于美国最早期的“总统奖”获得者的追踪研究。

这些最早的获奖者的成就和事业已基本尘埃落定,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依旧有很深刻的启发。在被追踪的145位获奖者中,虽然后来拿到博士学位或专门职业学位的人占70%,远高于同龄普通群体的12%,但正如我国的高考状元一样,不管是从财富上还是从是否成名上看,没有人成为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。他们虽然高中毕业后多数上了很好的精英大学,也获得了一些奖项,但是工作后的获奖

世间有个能量守恒定律,一方面做得过多,另一方面就欠缺了。这些获奖者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准备高考中,却忽略了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,导致他们在骄傲和自大的同时,也容易在挫折面前无所适从、情绪低落。



经历就乏善可陈了。成就和事业靠的不只是考试,甚至美国总统奖这样高标准的大奖,也无法实现对真正杰出人才的甄别。每个人事业的发展凭借诸多因素,正如其中一位获奖者所说:“不要认为,在1964年总统学者活动上所认可的高智商和成绩,就一定会在每件事上都带来名或利,事实上,许多因素(如犯罪受害者、家庭中重病号、经济危机等)对高智商者的影响与每个美国普通公民一样。”

数十年后,获奖者们谈到获奖的负面作用,或者说过于

投入学习的负面效应,更值得我们深思。首先,由于他们早期的表现,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奖项,他们的自我期许以及旁人对他们的期待值都变得更高。这种不现实的高期许,容易带给他们压力和沮丧,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,不管做得如何总会受到别人的议论,压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大。其次,过于投入到学习中,缺少了其他方面的学习和锻炼,包括情感处理、人际关系、目标设置等。一个获奖者对一个在校表现很好的学生总结了一句简单但有力的话,“你

可能是聪明的,但需要时间去培育。”世间有个能量守恒定律,一方面做得过多,另一方面就欠缺了。这些获奖者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准备高考中,却忽略了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,导致他们在骄傲和自大的同时,也容易在挫折面前无所适从、情绪低落。这些学子在学业上太过顺利,过多的鲜花和掌声围绕他们,导致他们受到挫折锻炼的机会极少。

这些一路走来的获奖者给教师和家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,比如“我鼓励父母和教师对待孩子要真正地把他们当作独特的个体对待,不要担心他们不能达到传统上的标准,要更注意发展培养他们特殊的天分和兴趣”,“教你的孩子有健康的自尊:不要傲慢,不要太谦虚。使他们在早年有一些他们很难练习和提高的事情的经历,比如音乐课或者体育,他们不能够马上做到,所以他们会明白,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,要给他们创作和做白日梦的时间”。

作为教育者和父母,他们可以通过认可个人的成绩来支持和鼓励他们天分的成长,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小心。当我们奖励年轻人的成绩时,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,奖励只是一个开始,接下来还要有长期的努力工作,要培养自己做事情坚持不懈的精神,并与指导老师和同事们相处融洽,寻求成长和发展的机会。

(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,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)

碎碎念

白尔依山尽

□叶倾城

龙应台的《目送》里面提到她的父亲,老年抑郁,渐渐丧失神智,却还记得要教混血的孙儿们“白日依山尽”。

这首诗,我爸也教过我。我大概四五岁,坐在他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,他推着我,过一座桥。是下班时分吧,从工厂出发,前方是红彤彤的太阳,慢吞吞地往下掉。家在桥的那一头吗?不知道。儿童尚不曾建立坐标概念,记忆中的家是一个小院子,像地球尽头的最后一个小镇,或者动画片里的森林小屋,与世界无往来,也不需要道路。

他指着夕阳,启发教学:“白尔(四声)依山尽,房河欲海流。”想必是声情并茂,循循善诱。我呢,三两下背熟,却一直不知道到底念了些什么。

直到小学三年级,进入上世纪80年代,整个社会从文化枯竭中缓缓复苏,爸排了一上午队,为我买回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我很快把线装书翻得稀巴烂,某一个石破天惊的瞬间,反应过来:可不就是千古名句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吗?我所熟悉的,是黄陂方言版。我爸,是黄陂(武汉近郊)人。

关于黄陂话,有一个武汉人都晓得的笑话:“八月十五吃月饼喝热茶,越吃越喝越有味。”笑点何在?“月热越”同音,效果可想而知。

我爸绝不是语言天才。他十几岁离开家乡,还在东北生活过十几年,也下过功夫练普通话,大场面上慢慢说,能说出俗称的“弯管子普通话”。但居家过日子仍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,一生都有浓厚的黄陂腔调,乡音不改,直到鬓毛已衰。

而类似的发音,竟在我女儿嘴里听到。女儿两岁多的时候,能说出五六个字的话,却喊不清楚“姥姥”,永远喊成“袄袄”或“恼恼”。一趟一趟,我抱着她,或者听任她连滚带爬地上楼。离家门口还有半层楼,她就开始热情万丈地喊“恼恼”或者“袄袄”。我立刻想起爸一辈子不屈不挠的黄陂话。只是这一老一小没有见过面,女儿出生之前,我爸就去世了。

我想念我爸,我没有放纵想念也没有克制它。伤痛渐淡,我以为它终会过去,却不料想念成为生命的一部分,像残缺的断茬,不再疼,却时时刻刻提醒你——你的缺失,你永远实现不了的完整。

口音会遗传吗?一如其他的事物。文字和语言,或者是两个系统。我纵使能操弄文字,却和我爸一样执拗地不改初音。我曾在若干省份长期生活,至今没学会任何一种方言。每个居处的耳濡,只是胡椒粉、香菜叶,撒在我本来的口音上,稍微润饰它的滋味,最后是南腔北调,甜汤加酸。

这是遗传吗?我还遗传了什么?天真、热情、莽撞——意识到莽撞后的无限自责。我有没有遗传到他对家人的爱?那个不重视教育的年代,高考尚未恢复,他却教我念诗、速算法、简单的日文甚至朝鲜语。

我又将遗传给女儿什么?基因可以选择吗?筛出我血中的优点、美善、精华,涤掉缺陷、幼稚和荒唐。但如果善就是愚蠢,才华就是畸形,怎么办?

也许,一切都是不可挑拣的。一生中多少次,夕阳假在城市间的高楼间,早早隐没,我又仿佛回到幼年的自行车大梁上,眼前一轮红日,耳边是浓浓乡音的“白尔依山尽”。脚下是小桥流水,桥那边是我家。

能把这场景替换成普通话版的吗?声与影的契合,如同双螺旋,已经锁死到不可分割。如果口音真的会遗传……就让它遗传吧。

幸好,三岁过后,女儿的发音准确起来。她现在说“姥姥”就是“姥姥”,一如玫瑰就是一朵玫瑰。



名家言

“加塞”是一种文化病吗?

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起舞,焦虑自然像野草一样疯长,逼着人们进入新一轮的“只争朝夕”……着急、没耐心、等不及,就要靠“加塞”来解决。



□刘天放

“加塞”被人痛恨,而近年加塞的恶习随着国人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算是有了点改变,可加塞并没有完全消失。人们大都不愿意排队,这不仅表现在等车、看病、购物上,其他场合均如此。国人对加塞趋之若鹜,可能源于“加急时代”的浮躁心理,或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释放,有人则说是割舍不断的文化链接。难道加塞也成了“文化原罪”?

在不少较为文明的国度,购物、看病、候机、候车等都要排队。此时,加塞成了一种“无文化”表述。加塞了,他人的鄙视全写在脸上,这会令加塞者满脸羞愧。

加塞,既有文化的因素,也有公德缺失的原因,不能全怪罪文化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吗?恐怕不是。传统文化中的礼让、仁孝、谦卑就是例证。古人在社会秩序建设上,提倡的是“和谐”。儒家倡导“中和”,重视“理之用,和为贵”。墨家强调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主张

个人与社会的有序一体。二者均排斥“加塞”。

加塞更多的是权力意识的变种。奥巴马去看牙医肯定要排队,他也不知道啥叫排队。而慈禧太后看病就不用排队,她也不知道啥叫排队,还命令医生跪着给她看病。现实生活中,干事用不着排队的人同样不少。估计除了退休这种排队没人与你争抢,到时候肯定不让你多留一天,为都知道了“例外”,有些人甚至为一己之利而暗中使绊、机关算尽。权力的插手和干预最令人感到不公和愤懑。

我们在上学、求职、提职、加薪等节点上均要耐心排队等待,且多是遵循简单的“先来后到”,可有些则是按照特殊的“例外”排序。其中,有些“排队”仅属表面,肉眼可见;有些则隐形,不是真排队。

当下,多数人似乎都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“加急时

代”。当人们欢呼物质生活日新月异之际,也正是精神世界被物欲的“快进”冲击得一片苍白之时。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起舞,焦虑自然像野草一样疯长,逼着人们进入新一轮的“只争朝夕”……着急、没耐心、等不及,就要靠“加塞”来解决。自己没有权力,就去寻找权力帮忙,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。一个人不排队,后面的人可能都跟着不排队,这是一种从众效应,或曰“羊群效应”。一头羊往里扎,群羊就都往里扎。要是图快,其实对所有等待者来讲,最有效、最快捷的方法便是有序地排队,可为什么大家会加塞,最终导致拥堵和混乱呢?因为看到别人加塞了,影响了自己的利益,那就跟着也去加塞,最后大家的效率都降低了。

有年夏天在乐山观光,就为了正面瞧一眼乐山大佛,我不得不排队等候。等我沿着狭窄的通道从高山顺着人流一点点挪到峭壁底部的时候,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半小时!虽费了些工夫排队,却也最终饱览了大佛的尊容,感觉就是

再费些时间也值。况且,大家在“等”字上是平等的,没人加塞或插队。我花时间排队,别人也花同样的时间等待,没有特权介入,我感到公平,丝毫没有受屈之感——这即是排队效率的胜利。

然而,在生活中,排队法则却经常失灵。以升学为例,中考有条子生、赞助生、特长生、择校生……让排队等候的学生和家长们吃尽苦头。无论是中考、高考,还是“国考”,本都必须按分数排序,可偏偏冒出些“加分”,且形式五花八门,什么奥数、航模、三好、体育、文艺……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就有十几种,而各地自己的加分种类就更多。虽说近几年已经取消了不少,但仍有存在。还有保送的,如体育界或演艺界的明星,不知怎么摇身一变都成了重点大学的“大学生”或“研究生”。就是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,在高考、考研等关键考试中,部分人也能得到照顾,不用考试即可入学,名曰“快速通道”,实际也可称之为“加塞”或“特权”,可谁去监督和怎么监督,如何避免暗箱操作,这在当下仍是个尚无法破解的难题。

“加塞”是当今社会文化的心理切片之一。杜绝加塞,恐怕不能单靠“文化转向”或“回归传统”就能解决,重要的是对权力的警觉和限制。加塞,即是潜意识中特权意识的膨胀,权力为逃避公平竞争另辟蹊径,暗度陈仓,绕开了公平竞争这座独木桥,领到了窃取利益的通行证。特权猖獗,老实的排队者就吃亏,既愤懑又无奈。在“加塞”这个“权力变种”的保护伞下,排队之人只能或望洋兴叹,或自己也去寻求权力的庇护。“加塞”无论在何种语境下,从权力角度分析都没什么差别。由此,称之为“加塞”也好,“插队”也罢,都是异化的权力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(威海)翻译学院副教授、文化学者、自由撰稿人)